张之洞、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研究

于月清

[提要] 面对国势衰落、民族危亡的形势,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,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,倡导教育救国、教育兴国;都主张废科举,改革封建教育制度;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,高度重视师范教育、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。同时,由于所处地位、所持立场的不同,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,张之洞强调“稳中求变”,梁启超则“趋变求新”;张之洞主张进行“通才教育”,梁启超则主张“新民教育”。他们的教育思想,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,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“人才教育”向“国民教育”的转变。

[关键词] 张之洞与梁启超; 教育思想; 比较

[中图分类号] K252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003—4145(2003)02—0086—03

于月清,聊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山东 聊城 252059

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和维新派巨子梁启超,同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,都对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张之洞(1837—1909),直隶南皮人,是近代洋务运动晚期的主要代表和洋务理论的集大成者。曾做过家庭教师,考取过觉罗官教习。及第后,先后出任过浙江乡试副考官、湖北学正、山西巡抚、两广总督、湖广总督等,并两度署理两江总督。晚年为大学士,入枢军机,并分管学部。他虽然不是一位终身职业性的教育工作者,但40多年的仕宦生涯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。梁启超(1873—1929),广东新会人,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。幼年曾受家庭封建传统教育,后从康有为受业,深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。积极协助康有为,发起“公车上书”。参加“百日维新”,成为“戊戌变法”的主要领导人物。“戊戌变法”失败后流亡日本,“思想为之一变”,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国民教育。

面对国势衰落、民族危亡的形势,同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张之洞和梁启超,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,倡导教育救国、教育兴国;都主张废科举,改革封建教育制度;都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,高度重视师范教育、女子教育和留学生教育。同时,由于所处地位、所持立场的不同,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又都呈现出自己的特色,张之洞强调“稳中求变”,梁启超则“趋变求新”;张之洞主张进行“通才教育”,梁启超则主张“新民教育”。他们的教育思想,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。

一、教育救国、教育兴国的共同主张

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清王朝封建统治岌岌可危,摇摇欲坠。在灭种亡国的危机面前,洋务大师张之洞、近代名师梁启超,均提出教育救国、教育兴国的主张。

内忧外患的清王朝,使张之洞充分认识到教育的作用,并把培养人才的教育看作是立国之本。在将中国与世界列强进行比较后,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的深层次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。他说:“国势之强弱在于人才,人才之消长在于学校,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,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备。”^{①(14)}因此,他强调把兴学育才放在自强求富的首位,他指出:“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,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。夫立国由于人才,人才出于立学,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。”^{②(684)}只有重视教育,开发民智,中国才有希望;要挽救民族危亡,自强求富,也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人才。基于这种认识,他不畏时艰,多方奔走,呼吁中国应以发展教育为立国、治国的根本。为此,他把广兴学校、废除科举、提倡留学教育等作为改革传统教育、发展近代教育的重大举措。

梁启超同样是一个教育救国、教育兴国论者。他多次指出:“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”,“今日为中国前途计,莫亟于教育。”^{③(32)}在《学校总论》中,他指出:“世界之运,由乱而进于平。胜败之原,由力而趋于智。故言自强于今日,以开民智为第一义。……智恶乎开?开于学!学恶乎立?立于教!”^{④(14)}并且认为:中国之强弱,由于教之未善,“亡之存之,废而举之,愚而智之,弱而强之,条理万端,皆归本于学校。”^⑤他甚至把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关键问题,在《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》中,他就指出:“欲求新政,必兴学校,可谓知本矣。”^{⑥(9)}“变法之本,在育人才;人才之兴,在开学校。”^{⑦(10)}总之,在梁启超看来,只有变法,兴学校,育人才,才能开民智,使国家富强,摆脱民族危机。

二、废科举、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共同愿望

张之洞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,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,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繁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。早在1898年撰写《劝学篇》时,他就专立《变科举》

一节,认为这一制度“文胜而实衰,法久而弊起,主司取便以藏拙,举子因陋以侥幸,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。”^{⑤(101)}因而主张“救时必自变法始,变法必自变科举始。……今日科举之制,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。”^{⑤(102)}从此,原来意义上的科举制度不复存在。为了稳妥地废除整个科举制度,在此基础上,张之洞又作了三次重大的努力。1901年,他与刘坤一合奏《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》,提出四条建议:“一曰设文武学堂,二曰酌改文科,三曰停罢武举,四曰奖劝游学。”^{⑥(47)}1903年,他与张百熙、荣庆合奏《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》,再次提出递减科举,“从下届丙午科起,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,暂行试办。”^{⑦(95)}1905年,他又与袁世凯等合奏:“请立停科举,以广学校。”这三次努力,对科举制度的废除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梁启超身为举人,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。他指出:“八股取士,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,行之千年,使学者坠聪塞明,不识古今,不知五洲,其蔽皆由此。”^{⑦(87)}外强侵略,割地赔款,“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,然尝推求本原,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。”^{⑧(21)}他说:“变法之本,在育人才;人才之兴,在开学校;学校之立,在变科举。”^{⑨(10)}“欲兴学校,养人才,以强中国,惟变科举为第一义。”^{⑩(27)}因此,他在《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》中向光绪帝建议:“将下科乡会试及此后岁科试,停止八股试帖,推行经济六科,以育人才而御外侮。”^{⑪(21)}

三、兴学校、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共同设想

科举封建教育制度的废除,在很大的程度上扫除了近代教育发展的障碍,而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又与学校的设立密切相关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,中国社会对西方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,张之洞、梁启超都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。

张之洞在《劝学篇》中就指出:“各省各道、各府、各州县皆宜有学。京师省会为大学堂,道府为中学堂,州县为小学堂。中小学堂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。”^{⑫(98)}这就初步设计了新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轮廓。1901年,清政府推行新政后,兴学热潮悄然兴起,欧美、日本的教育制度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来。当年,张之洞与刘坤一上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》,在第一折中就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教育方案。该方案是清朝官员提出的第一个包括系统学制、课程设置、教育内容的教育方案。1902年10月,张之洞奏呈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》,系统总结了他兴学的情况和经验,从中提出了15条办法和办学要旨,指出了进一步开展教育改革的方向。张之洞于1904年进京协助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参酌日本和欧美学制,在清政府《壬寅学制》(1902年)的基础上制订了《癸卯学制》——中国第一个颁行全国并付诸实施的近代教育制度。为改变教育管理机构的落后局面,1902年张之洞率先在湖北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——学务部,统辖全省教育。鉴于“各国均设有文部大臣,专事其事”,张之洞又向朝廷提出在京师设立总理学务大臣,统辖全国学务。1905年清政府设置全国性的教育专管机构——学部,张之洞以军机大臣的身份兼管学部,直至去世。在对教育内容的组织原则

方面,张之洞提出著名的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说。张之洞的这种教育制度论,实际上是一种新旧杂糅的拼合体,集中凸现了晚清“洋务”教育的过渡性特征。

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的领袖人物,梁启超则从教育学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学校教育,倡导在全国范围设立完整的各级各类学校,并提出一系列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。在《教育政策私议》中,他模仿日本教育制度,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状况,设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制度。他先是拟定《教育期区分表》,指出不同年龄阶段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特点,诸如知、意、情、身体、自观力等方面,以此作为划分教育阶段的标准。他所制订的教育制度,制订在清政府《壬寅学制》公布前,可以认为是梁启超独立研究西方教育制度的结果,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根据年龄特点制订的教育制度。在对教育内容的组织方面,梁启超认为洋务派所提倡的“艺学”太多,忽视了政教之学,因而反对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的“中体西用”说,主张“政学为主义,艺学为附庸”。他在《西学书目表后序》中就指出:“舍西学而言中学者,其中学必为无用;舍中学而言西学者,其中学必为无本。无用无本,皆不足以治天下。”^{⑬(38)}因此,他在《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》中主张,中国应效法日本,“以六经诸子为经(经学必以子学相辅然后知六经之用,诸子亦皆欲以所学治天下也),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言辅之,以求治天下之道;以历朝掌故为纬,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,以求治天下之法;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,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,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。”^{⑭(106)}梁启超以“政学为主义,艺学为附庸”这个原则来组织教育内容,对于培养维新人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与此相关,张之洞和梁启超都非常重视师范教育制度的建设,二人均可认为是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开创者。张之洞始终认为“学堂必须有师”,振兴教育关键在师资。他在《奏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》中就指出:“查各国中小学教员咸取材于师范学堂,故师范学堂为教师造端之地,关系至重。”^{⑮(13)}由他主持制订的《癸卯学制》,不仅将师范教育放在各级教育之首,而且第一次把师范教育独立出来,把师范分为初、优两级,这与现代教育制度基本吻合。梁启超更于1896年撰写的《论师范》一文,专门论述教育问题。他认为:“师也者,学子之根核也”;^{⑯(34)}“故师范学校立,而群学之基悉定”;^{⑰(35)}“欲革旧习,兴智学,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。”^{⑱(37)}他还主张参考日本师范学校之制,“自京师以及各省、府、州、县,皆设小学,而辅之以师范学堂。以师范学校之生徒,为小学之教习;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,使课之以教术,即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,验师范生徒之成就。”^{⑲(37)}

四、“稳中求变”与“趋变求新”

尽管张之洞、梁启超两人在上述各个方面,均有比较一致的主张,并且张之洞、梁启超两人的一生都在新旧之间摇摆、调和,表现出双重性格的复杂性。但由于所处地位、所持立场的不同,他们二人的教育理论也有一些差别。这种差别,表现在张之洞的“稳中求变”和梁启超的“趋变求新”上。

张之洞早年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,他一方面肩负着传统的重压,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新时代的门槛外探头张望;他对新世界、新事物缺乏信心和把握,所以他宁愿采取保守的办法,在抱牢传统的前提下,腾手摸索变幻的世界。他的“教育救国”,大力办新式学堂,也只是要大力培养忠君爱国之士,维护封建专制统治,而绝对不想改革封建统治制度。政治上的守旧与教育思想上的进步,是他双重性格集中体现。他对“变科举”采取的策略是循序渐进的。正如梁启超在《戊戌政变记》所言:“八股取士锢塞人才之蔽,李鸿章、张之洞何尝不知之,何尝不痛心疾首而恶之。张之洞且尝与余言,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,而不闻其上折废之者。”^{⑦(84)}他所主持制订的《癸卯学制》,他所兴办的学校,集中体现了他的“中体西用”教育思想,虽然以欧美、日本学制为蓝本,将学制系统与行政系统分开,但同时又具有极其浓厚的封建色彩,强调学习儒家经典,在思想上强调“忠孝为本”。他所致力的“人才教育”,所要造就的“道义兼通、文武兼通、内外兼通”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,在思想上必须是忠君爱国的,能力上必须是博古通今的,可以随时备国家任使的。

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,虽然思想有过反复,但在总体上是激进的,是“趋变求新”的。在“教育救国”方面,他始终认为国家富强的根基在于文化教育,并且进一步认为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。他在“教育救国”的前提下,强调学校的政治功能,在当时救亡图存的历史条件下,无疑具有基本的合理性和历史进步性。这种主张赋予教育以新的时代使命,确比张之洞更加触及封建政治制度,更为激进。在“变科举”方面,早在1898年他就亲自向朝廷上《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》,言辞激烈,径直要求“废八股试帖体格”。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方面,尽管他对“政学”的理解实际上并没有超出“中体西用”的局限,但他也对张之洞的“中体西用”极尽咒骂之辞,而大力倡导“政学为主义,艺学为附庸”说。

五、“通才教育”与“新民教育”

张之洞作为清政府的一名重臣,早年受过严格而正统的儒家教育,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的。他兴学校的目的,就是为了培养既有封建道德又有西方科学技术的忠君爱国之士,在资本主义列强的环伺中使中国由弱转强,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。张之洞的人才教育观经历了一个由传统的“重德”到“重艺”再到“通才”的转变。早在其任四川学政编撰《书目答问》之时,作为一个守旧的清流党,他的人才观与中国传统的观念基本一致,都是“重德”的,即要为朝廷培养知耻廉政的士大夫。就任山西巡抚以后,洋务派大力倡行西学给了他很深的影响,逐渐转向洋务派,并且以“后来居上”的势头大力兴办新式教育之时,他对人才的要求是“习知西事,通体达用”,就是要具有传统道德知识的同时,更要具备西学专门知识的专门人才。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,出于维护封建科举制的需要提出“分场考试”以“变科举”时,他主

张“于博学中求通才”,“于通才中求纯正”。这种“通才”观,在由他与张百熙、荣庆共同拟定的《学务纲要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纲要规定:“京外大小文武各学堂均应钦遵谕旨,以端正趋向、造就通才为宗旨,正合三代学校选举德行道艺四者并重之意。”^{⑧(197)}以造就一批“道义兼通、文武兼通、内外兼通”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。

梁启超猛烈地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,认为其最大的缺点是培养出来的人缺乏国家观念;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,虽有作为一个人的资格,但却独独没有作为一国国民的资格。因此,他认为教育应“以造就国民为目的”,并且极力倡导“新民教育”,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品格的“新民”。他认为中国之弱在“人才乏绝”,而“欲振中国,在广人才”。但人才必须是“新民”,“新民”必须具有新道德、新思想、新精神。他在《论新民》一文中对“新民”的解释是:“新民云者,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。新之义有二:一曰,淬厉其所本而新之;二曰,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,二者缺一,时乃无功。”^{⑨(221)}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:“新民”,不应墨守固有传统文化的成规,而应对固有文化加以磨砺扬弃,从中出新;不应一味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,而应以其补足传统文化中本来就从来没有的内容,从中求新。

张之洞和梁启超的教育思想,体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教育思想的不同,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由“人才教育”向“国民教育”的转变。尤其在对教育目标的认识上,梁启超不像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一样,偏重于专业技术教育,培养专门人才,而是转向国民教育,开发民智,培养具有新精神新品格的“新民”,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。这在教育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,也是张、梁教育思想在本质上的不同。

①张之洞.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四[M].

②张之洞.张文襄公全集第一册[M].中国书店,1990.

③梁启超.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九[M].中华书局,1989.

④梁启超.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一[M].中华书局,1989.

⑤璩鑫圭、童富勇.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·教育思想[M].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7.

⑥舒新城.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[M].人民教育出版社,1981.

⑦梁启超.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一[M].中华书局,1989.

⑧梁启超.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三[M].中华书局,1989.

⑨李华兴、吴嘉勋.梁启超选集[M].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3.

(责任编辑:李玉明)